

曹禺与剧专第三、四届学生合影于抗战时期的江安

曹禺在江安轶事

□张 毅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各种组织、学校等,纷纷向大后方撤离疏散,曹禺也随剧专迁往长沙、重庆,最后于1939年4月再迁到川南江安。在江安这个宁静、闭塞的小县城,度过了他难忘的三年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迎来了曹禺的又一次创作高峰,《北京人》《蜕变》《正在想》等作品相继问世,《家》的改编也酝酿成熟。在这个环境条件比较差的小县城里,曹禺仍然坚持进行大量的戏剧创作和教学,他的执著精神,为话剧事业特别是对抗战戏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在这三年中,曹禺与江安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在40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深情地写到: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永远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哺育之恩。曹禺自称在江安时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可称“人杰地灵”。

抗战以来,国民党政府大小各级机构的腐败状况,给曹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他耳边时常响起周恩来在1938年同他谈话的声音——“抗战必胜,最后的胜利必属我们中国人民”。创作的激情和冲动让他不能自己,必须一写为快。曹禺决定以一个省立后方医院在抗战初期的遭遇为题材,揭露抗战中大后方的动摇分子和腐朽人物,鞭挞当时黑暗丑恶的现实。

1940年2月初,曹禺快要构思完毕,正准备进入写作阶段。剧专接到妇女工作队的邀请,赴重庆作劳军公演。学校决定4月赴渝公演,演出两个现成的大戏,一个选顾一樵的《岳飞》,一个是余上沅、王思曾合作的《从军乐》。余上沅觉得一次旅行公演,带两个戏太少了,希望曹禺把正在酝酿的新戏赶写出来。在朋友们信任的催促下,曹禺推托不过,只好答应赶一赶。

曹禺将这出戏取名《蜕变》,构思大体完成后,他请学生季紫剑(季虹,上影厂演员)帮刻钢板,吃住在他家里。季紫剑听说跟曹禺一起工作,心想这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满口答应。

第二天,曹禺和季紫剑就开始紧张的工作。曹禺家住江安开明绅士张乃赓的乃庐公馆内,房间在楼上,总共约十五六平方米,外间是饭厅,也是创作室、会客室,靠窗有一个竹制旧书架,靠墙一对旧沙发,中间有一张小方桌;里间是卧室,有一张床,一个矮斗柜,一张小长桌,拥挤不堪。小斗柜紧挨着床,柜上放着纸、笔和煤油灯,煤油灯旁放着一盒火柴。这样,晚上创作灵感来了,曹禺就可以随时抓起笔来写。

饭后,曹禺就与季紫剑共用这张吃饭桌子开始工作。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曹禺与季紫剑白天同吃、同工作,晚上同榻而眠,闭门谢客,日夜苦干,就连张家的佣人都说:“每天晚上都是人家都睡了,还看见他点起灯写字,早晨我一起来打早火,看见他又在用功了。真像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将来不晓得要干啥子大事哦。”

就这样,季紫剑也了解了曹禺的创作习惯。他发现曹禺在写作时,有时握笔的手指不断地跳动,便是在思考、推敲。曹禺右耳朵边有一个突出的小肉球,写作时,他常用右手不知不觉地去捻弄它,而被他的学生们戏称为“灵感包”。一次,几块蜡纸已经刻完,季紫剑向曹禺索稿,只见他正用右手捻那个小肉球。他问:“万先生,我刻好了,你写好了吗?”曹禺好像没有听见,只顾捻动他耳边的小肉球,季紫剑起身走到曹禺身旁,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句:“万先生,我刻好了。”曹禺猛地一惊,定神一看,是季紫剑在叫他,他生气地说:“你不要催我好不好。”季紫剑猛然醒悟,他这一叫打断了曹禺的思绪,忙回到自己座位上,整理已经刻好的蜡纸,以后再不敢中途打断曹禺写作。

曹禺虽已完成了《蜕变》的总体构思,但在具体执笔时,还是反复酝酿。灵感袭来,想到一场好戏或一段对话就奋笔疾书,写完一张就放在一边,到整理时再将它串在一起。剧本经他反复推敲、修改多次后,才写在江安产的竹纸上。因为长时间的连续熬夜,人已十分疲劳,加上夜晚受

了凉,在剧本快要完稿时,曹禺患上了重感冒。

1940年4月15日,大型话剧《蜕变》被剧专带到重庆,在国泰大戏院举行了公演,获得很大成功,轰动了整个大后方和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文学大师巴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国立戏剧学校(1940年7月在江安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已经迁到川南小城江安,他随后由重庆来到江安,看望他的朋友曹禺。

巴金到了江安,就住在曹禺的家中,两人相见,百感交集。当时的江安县城没有电灯,晚上7点后全城漆黑。巴金、曹禺多数时候在一起聊天,两人常对坐在一张长写字台两边,在昏暗摇曳的桐油灯下谈心。他们谈抗日战争,谈社会政治,谈人生感悟,更谈作家的责任与中国戏剧文学的前途……曹禺讲述了自己在江安新写的剧本《蜕变》《北京人》的创作过程,更谈起《家》,他流露出想改编《家》的意思,巴金鼓励他试一试,并对他说:“你有你的‘家’,你有你个人的情感,你完全可以写一部你自己的《家》。”通过几天相互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坚定了曹禺改编《家》的决心。

在江安,曹禺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他时常与吴祖光、沙梅等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清茶,一坐就是半天。他们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过往人群。

观察生活是他的习惯,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举止记录下来。有一次,大街上一个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让他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就尾随这个人。这人原是江安的一个大地主,名黄久安。过了不久,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着他,人又不认识,很奇怪,便有点儿害怕了,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一个亲戚家里躲藏起来。其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万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产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磨,怎样做豆浆,又怎样点卤把豆腐压出来。这样,接连观察了三天,天天在那里细细看着、琢磨着,有时还仔细地询问这位老婆婆,临走时,他还给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在江安的日子里,曹禺不断地将他听到、看到、感受到的东西都融于所编剧本之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和戏剧情节。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间还流传着曹禺的故事。

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厌恶的是耗子。江安的耗子够厉害,是一个头大,二是多,到处都有,无孔不入。吴祖光曾写过一篇曹禺与耗子的故事,他说:“曹禺最憎恶、最怕的是什么?是耗子。耗子给他这么大的刺激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年在江安教书的时候,曹禺已在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有一个厚厚的本子。可一天他打开抽屉时,那本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他很无奈地又重新整理编写,可又一次遭到同样的命运,最后他不得已采取了特殊保存方式,才将剧本完成。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路上碰到曹禺,他说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别凶,右肩上时时发抖,这病状的确是不寻常的。下了课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经坐在那里,说肩上抖得很凶,心里也不好过,所以告诉学生说胃病犯了,早点下了课。说着说着又抖起来了。他用力一按‘哎呀!他脸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说我们有多么惊奇,他匆忙把棉袍丢下扔在地上,掩着脸,一溜烟跑到墙犄角,棉袍里子上爬着一只大耗子,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大概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里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不出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后来《北京人》问世,曹禺把耗子巧妙地写进戏里,每逢演到出现耗子的台词时,引起了极有“喜剧味”的舞台效果。以致于四十多年以后,江安代表到北京拜望曹禺时,他还问到,江安的茶楼还多吗?耗子还多吗?

儿出生的喜悦还没有消退,我家先生所在的报纸停刊了,当时我的生活面临的情况是:一个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一个意志消沉的男人。要说女人是大地我真的很同意,大地是能够承载一切的,哪怕是天塌下来了。我当时的工资是1100元,为了我们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我殚精竭虑、勤俭持家。因为孩子小,一会儿尿裤子,一会儿摔倒了,需要大人无时无刻地看护,我没有完整的时间写作,再说写散文似乎也挣不到什么钱,我只有关源节费。先是辞了帮忙看孩子的保姆,自己看护孩子做家务,不只是省下了请保姆的费用,保姆那种无心的浪费也让我无法忍受,我洗衣服的水一定要留下冲厕所擦地板,能卖废品的东西也决不轻易地扔掉,女儿的毛衣、毛裤、毛袜子都用旧毛线自己织,有时还用我的旧棉衣给她改件小背心。到了她上幼儿园,我也是选择了离家近的社区幼儿园,因为公立幼儿园不但离家远,费用比社区的贵一倍还要多……一次卖废品的时候,收破烂的都笑我会太过了,因为我攒了一大堆小药盒子。而且我很快就成了超市常客,只要听说哪里有特价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我时常很坦然地穿十几块钱的服装去参加各种会议,给我女儿也买这种便宜又舒适的衣服穿。其实,当人把全部的注意力完全专注于这样的生活时,是不会为自己的处境悲哀的。

直到有一天,北京的好友孟晖说起自己又出了一本新书,我既羡慕又为自己不能写作而

在人间

庐山,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满目葱茏、雄奇挺秀、令人心旷神怡的人间仙境,也是一个风云变幻、人文荟萃、令人思绪万千的历史文化名城。我年近八旬,终于如愿以偿,得有机会首次来到匡庐,亲眼一睹庐山真面目,颇感幸运,不免有几分喜悦和激动。

漫步在风景如画的花径,情不自禁地默默吟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在白鹿洞书院桂花树下品茗,细细咀嚼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著名的“朱子白鹿洞教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站在庐山植物园里漂砾垒起的陈寅恪墓碑前,面对黄永玉手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不能不由衷佩服国学大师的学识与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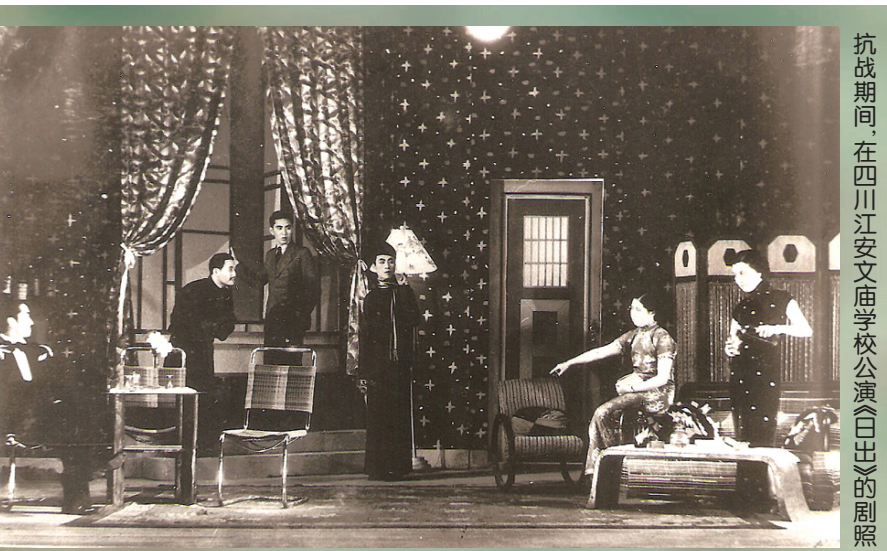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在儿童文学舞台上跑龙套长达半个世纪。上庐山,自然对庐山与儿童文学的情缘特别关注,饶有兴趣。那天,参观芦林一号毛泽东旧居,走进一间房子,那里陈列着毛泽东三次来庐山读过的图书,如《庐山志》《资本论》《鲁迅全集》以及毛泽东建议中,高级干部都要读的《哲学小辞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在这间房冷僻的一角,七、八本我熟悉而又倍感亲切的安徒生童话集,如《海的女儿》《母亲的故事》《夜莺》《冰姑娘》(叶君健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版)等清晰地映入眼帘。一看说明词才知道,那是1959年8月的一天,庐山会议期间,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及夫人水静去180号住宅(即“美庐”)看望毛泽东,水静看到毛泽东案头放着那几本安徒生童话,不禁好奇地问:“主席,你还有空看童话啊?”主席说:“写得好的童话往往也包含着许多哲理,能给人以启示。凡是有价值的书,我都要看。”寥寥数语,一下子拉近了毛泽东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原来,我只知道1955年秋,毛泽东在共青团中央反映儿童读物奇缺的报告上作过批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中国作家协会也就此做了自我批评,制定了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郭沫若、冰心等倡议“一人一篇”,从而迎来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第一个春天。毛泽东在庐山读安徒生童话,对我来说,是前所未闻,可说是个新发现。这对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翻译、出版的人,无疑也是一种激励。

从毛泽东在庐山读童话,我不禁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在庐山召开过两次关于儿童读物、儿童文学的具有重要意义。这两次鲜为人知的会议,印证了儿童文学与庐山有着难分难解的情结。

1978年10月在庐山牯岭江西礼堂(现庐山文化馆)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是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会。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陈伯吹、严文井、叶君健、贺宜、金近、包蕾,诗人任溶溶、鲁兵、圣野、张继楼、柯岩、金波等200多人应邀到会。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高士其因故未能到会,也都作了书面发言。陈伯吹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庐山在秋天里的春天》的发言。严文井在会上讲了一个有趣的童话故事:200多人上山寻宝,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宝——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的宝,一个千高高兴兴,满载而归。诗人鲁兵则献诗一首:“今年重九胜春光,小百花开满翠岚,牯岭秋阳初温暖,云天万里尽飘香”,以此表达自己的愉悦心情和真诚祝愿。

在这次会议上,冰心表示要当好两亿少年儿童的“炊事员”,努力给孩子们做出色、香、味俱佳的饭菜来。张天翼表示要多为孩子写作,把孩子们从精神饥荒中救出来。金近则为“小儿科”辩护,表示甘当“小儿科”大夫,努力医治十年浩劫在孩子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四人帮”、“左”倾思潮设置的禁区被一一打破。“只要有利于少年儿童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什么题材都可以写”,“不讲母爱,难道讲母恨吗?”童心、情趣、年龄特征也都被认同了。

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揭开了我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新篇章。有的论



□束沛德

儿童文学的庐山缘

者认为“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界从长达十年的政治噩梦中复苏的第一个信号”;有的论者描述“庐山会议像一声春雷,迎来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园地百花争妍的春天”,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这里不妨穿插一则文坛轶闻:上海来参加庐山会议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贺宜、鲁兵、包蕾和以塑造“三毛”经典艺术形象著称的画家张乐平,“文革”前夕曾在沪上四如春酒馆相聚,时隔十多年,没有机会再聚会,于是在庐山会议期间相约到牯岭云中餐厅小酌。他们一醉方休,回到住处,当晚鲁兵赋诗一首:“同上云中楼,共饮云中酒,归来已微醺,似在云中走。”由此可见当年儿童文学界朋友兴奋激动之一斑。真是巧得真,这次国际作家写作营临别依依的餐叙,所在的居家食府,正好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云中餐厅。从中外作家的欢声笑语、频频干杯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沪上四位老友欢聚对酌的动人情景。

1979年庐山会议后,迎来了一个为少年儿童创作、出版图书的热潮。1977年,全国有2亿小读者,全年出版儿童读物才192种,平均每13个孩子才有一本书。到1983年,一年出书3900种,发行7200多万册,比1978年增加了十多倍。一批年轻的、有才华的儿童文学新人们脱颖而出,崭露头角,为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这个背景下,1986年10月,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前身)在庐山召开了一次部分中青年作家座谈会。这虽是一个地方出版社主办的会议,到会的作家也只有20多位。但这次庐山会议在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却有着特殊的、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次座谈会讨论了儿童文学现状,展望了儿童文学发展趋向和未来前景。会上决定编辑一套以“新潮”为名的儿童文学创作丛书。从1987年至1989年,这套丛书先后出版了《八十年代小说选》《八十年代童话选》《八十年代诗选》《探索作品集》《中国少女心理小说集》《中国少年探险小说集》《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八十年代乡村小说集》《中国少年诗人诗选》等十余种。《新潮丛书》荟萃了反映我国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新的创作理念、新的艺术追求、新的创作手法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记录下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独特光彩的一页,是考察、研究当代儿童文学发展思潮的重要文献资料。

那天,参观庐山老别墅故事景区,与原林彪别墅擦身而过,我不禁想起与《新潮丛书》有关的一段小片的插曲。参加那次中青年作家座谈会的高洪波、曹文轩、夏有志,当年被安排住在那幢四周树木茂密的林彪别墅里。住进之后,曹文轩连连做怪梦,床前竖立的高高的氧气瓶,使他每夜梦见戴着口罩的白衣女郎默立在床头;夏有志也由于大讲鬼的故事而吓下了自己。于是他俩都毅然决然地搬迁到另一幢别墅去了。下着的高洪波,清晨尚未起床或午睡正酣时,一次又一次地被参观林彪别墅的游人所干扰,苦不堪言,从此也不愿再住什么名人别墅了。蕴藏在《新潮丛书》背后的这个多少有点怪异、神秘、带有恐怖色彩的故事,并没有压抑、磨损秀美的庐山赋予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创造激情和革新勇气。作家、学者曹文轩代表编委会写的那篇富有真知灼见的总序,就是在庐山上酝酿、讨论而写成的,这篇“具有总结过去和重新开始的意味”的序言,宣称:儿童文学“要从艺术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道”。它旗帜鲜明地主张:“我们赞成文学要有爱的意识……肩负着创造一个充满爱的未来世界的天职”,“我们推崇遵循文学内部规律的真正艺术品”,“我们尊重文学个性……个性的消亡,是文学莫大的悲剧”,“我们赞同文学变法。变法,是顺应世运、顺应生活的大潮”。这篇宣言式的总序,标志着儿童文学观念的变革和艺术创新的追求,显示着新的美学原则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崛起。也就在这前后,一味强调教育作用的文学功利主义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艺术上探索、创新的热情、勇气得到鼓舞,儿童文学真正回归到文学。“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成了作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不同题材、形式、风格的佳作层出不穷,迎来了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春天。回望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观念变革、回归艺术的格局,我们忘不了《新潮丛书》的编者在庐山登高一呼的胆识。

真是无巧不成书。2010年中国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的议题,正好又是一个与儿童文学紧密相连的主题——自然与文学。大自然文学不仅属于少年儿童,而是属于全人类,但儿童文学最贴近大自然文学。大自然是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童年、母爱、自然)之一。大自然文学不仅充分展示大自然的美丽、丰富、神奇,使少年儿童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了解大自然的奥秘,使他们的情操得到陶冶,胸襟更加开阔,感情更加丰富;同时可以启迪、引导少年儿童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培养地球家园意识,树立生态道德,激励他们用自己的热情、智慧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建功立业。大自然文学从新的角度观照自然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审视自然的美、生命的美,它有着独特的审美追求,富有全人类共享的审美价值。

大自然文学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文学。它在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上,可以发挥“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独特作用。愿大自然文学这面绿色的旗帜在庐山高高飘扬,在东西南北、五湖四海高高飘扬,放射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美学光辉。

我热切期待着中国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有朝一日邀约世界各地儿童文学作家,包括国际安徒生奖、格林奖、纽伯瑞奖的得主,有缘千里来相会,一起在庐山探讨如何使少年儿童更好地走进大自然,阅读大自然。让绿色拥抱大地,让大自然文学和绿色阅读走进孩子心中。这是时代的呼唤,地球母亲的呼唤,也是亿万小读者的呼唤。让我们一起倾情于孩子的精神成长、心灵成长吧!

懊丧。我说自己还在尘世里翻滚,已经不是一个作家了。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意外的,她什么也没说立刻给我寄来1000元钱。拿着那张汇款单,我忽然很难过,心里堵着,一直哭,一直哭,就是在干活儿的时候也止不住流泪。一方面我十二分地感念于只见过自己的朋友能够如此仗义相帮,另一方面我又为自己感到悲哀——难道我现在已经过到要被人救济的地步

在人间

□苏 莉

了吗?我觉得我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有时生活的压力不是一下子就压住你的,在你还有不甘的时候你会想方设法地努力挣扎,等到种种的努力没有什么回报时人就可能沉沦下去。其实我一直都很焦虑,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日常生活中充满着这种不安,我努力把生活打理得温馨、舒适,然而我的身体不会隐藏,它开始出现各种使我日渐衰弱症状。我的腰经常弯下去就直不起来,还莫名其妙地得

过面瘫,针灸了四十多天才好。而且我经常失眠,半夜两点,准时醒来,直到五六点才能睡着,可是一天的劳作又要开始了。我尝试着在这个时间写点什么,后来我就写了《安徒生笔下的寂寞艺术家》。其实我有轻度抑郁症,在青春期的时候曾经十分严重,我很感念文学,写作一直都是我舒缓压力的最佳方式。写作一直不是我证明自己价值和才能的东西,它一直都是我安放心灵的家园。

我努力做一个宽厚的女人,不去抱怨我家先生,在这样的时期我希望能保持着他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体面和尊严。想当初他抛弃一切跑来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珍贵的女人,居然能让一个男人舍弃一切,所有的后果当然我都要承担。我和他一起去跑工作、见领导,几经磨难,终于在我女儿6岁时他找到了适合他的位置。套用一句广告:所谓他好我也好。他不好,我自己也感觉很不好。我就是有了再多的成绩,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

过惯了简单的生活,直到现在,如果我买衣服超过了150元心里就会有罪恶感,即便听人劝说,下决心买下来了也很长时间不好意思穿出来。我家先生似乎也这样,原来他买书从不吝啬,现在买了新书回来先藏好,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问他什么时候买的,他总是闪烁其词:“这个?早买的,你忘了吗?”好像我总是忙过日子都变得愚蠢起来了。

2007年年初,我带着女儿和同事们一起去

了大连。在一个巨大的商业区,同事们都冲进商场里选购着他们心仪的东西,我和女儿则坐在专为消费者们准备的休息区里等他们。一个当地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人和我攀谈起来,她问我为什么不去逛一逛,我说没有我合适的。她推荐了另一个大连的商业街,说那是品牌店,我没好意思跟她说我口袋里没有那么多钱。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从哪儿来,我说内蒙古,她说多见,看她像我一个海归!海归,那当然是多见识广、讲究的人了,最起码飞过飞机呀!我看了看自己身上从批发街买来的38元一套的服装,奇怪她会对我这个丝毫不讲品位的廉价主义者有这样的感觉。

后来一想,岁月塑造人,生活磨砺人,在人间,只要有足够的谦卑,把自己匍匐在大地上,自然会拥有无边无际的力量,人也会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光彩来吧。

人间的事情总是循环往复的,在我们旋进谷底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的机遇给我们,我要感谢我们的萨仁书记,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我能够如愿结集出版自己的新散文集《天使降临的夏天》(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他都给了我最有力的、决定性的帮助。尽管我们曾经艰难,但我们还是幸运的。生活虽然曾经灰暗,但是总有希望。所以,无论何时何地,处于什么样的境遇,先不要抱怨,要学会坚持。生活总会给那些坚持到底的人最丰厚的回报。